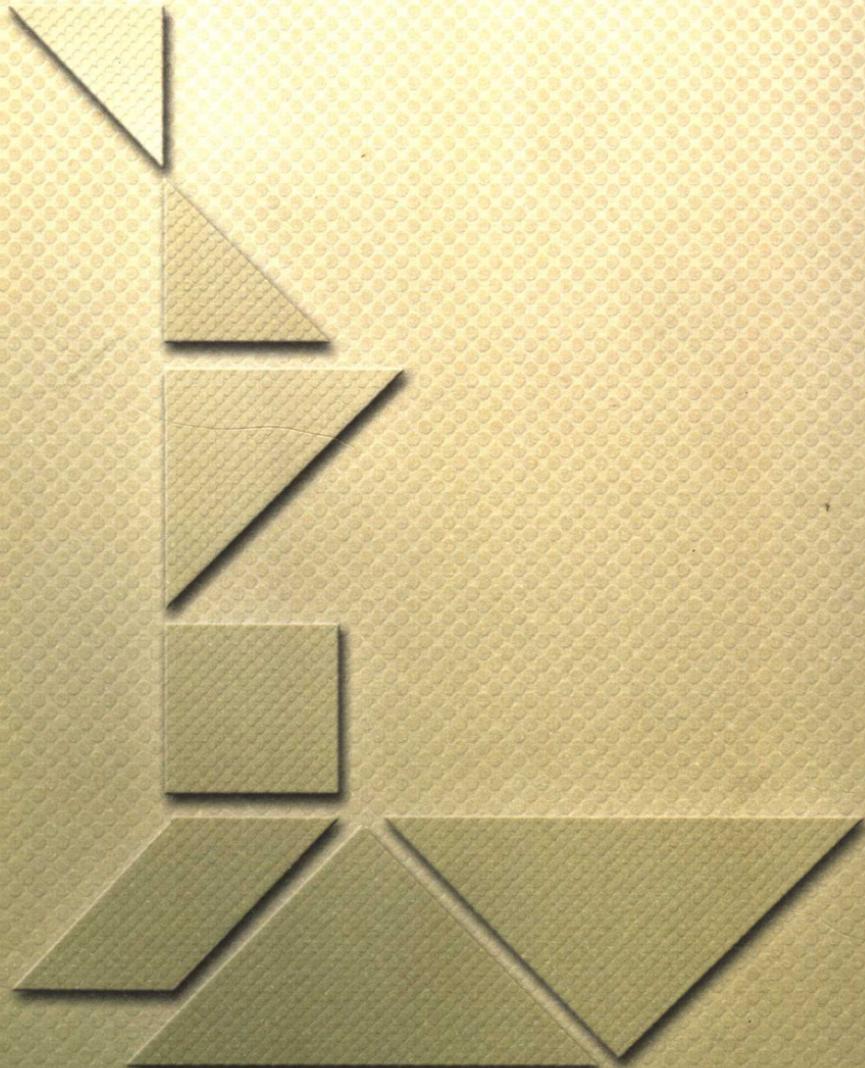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精神的分裂

——与老年德里达对话



尚杰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第一辑目录 (2005)

1. 《法兰西思想评论》第一卷，高宣扬主编
2. 《法国近代哲学》，冯俊著
3. 《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下卷，高宣扬著
4.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高宣扬著
5. 《利科的反思诠释学》，高宣扬著
6. 《超越现代：马利坦对现代世界的批判》，徐卫翔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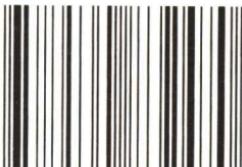
第二辑目录 (2006)

1. 《法兰西思想评论》第二卷，高宣扬主编
2. 《萨特：1905～2005》，高宣扬著
3. 《当代法国伦理思想概论》，冯俊著
4. 《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郭宏安著
5. 《德里达的未来政治》，陆兴华著
6. 《西蒙娜·薇依早期文选》，西蒙娜·薇依著，徐卫翔译

装帧设计：林家阳/陈益平

制作处理：陈益平

ISBN 7-5608-3247-4



9 787560 832470 >

定价：21.00元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精神的分裂

——与老年德里达谈话

尚 杰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的分裂——与老年德里达谈话 / 尚杰著. —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6. 4

ISBN 7-5608-3247-4

I. 精… II. 尚… III. 德里达, Y. (1930～) —
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研究 IV. 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623 号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精神的分裂——与老年德里达谈话

尚 杰 著

责任编辑 张德胜 责任校对 谢惠云 封面设计 陈益平

出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发行

(上海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319 000

印 数 1—3 100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8-3247-4/B · 24

定 价 21.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

学术顾问及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托尼·安德列安尼(Tony Andréani),巴黎第一大学教授

奥利维耶·布洛赫(Olivier Bloch),巴黎第一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法国哲学会副主席

贝尔纳特·布尔乔亚(Bernard Bourgeois),法国哲学会主席,法国
精神与政治科学院院士

程抱一(François Cheng),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贾克·董特(Jacques D'Hondt),法国哲学会前主席,法国布阿济
耶大学终身教授

乔治·拉毕卡(Georges Labica),巴黎第十大学第一副校长兼哲
学系主任

菲里浦·雷诺(Philippe Raynaud),巴黎第二大学政治学教授

安德列·多舍尔(André Tosel),法国尼斯大学前副校长,巴黎第
一大学和尼斯大学前哲学系主任

主编 高宣扬

编委 (以拼音字母为序)

陈家琪 杜小真 段德智 冯俊 高宣扬 郭宏安

刘国英 刘小枫 莫伟民 钱捷 尚杰 孙向晨

孙宜学 孙周兴 汪堂家 许钧 徐卫翔 杨大春

于奇智 章仁彪 张尧均 朱静

丛书总序

法国现代派文学的创始人和后现代思想的启蒙者波德莱，在评论雨果的《悲惨世界》时说，作为世界级的伟大作家，他具有诗人般的才华，兼备思想家的深刻洞见，又不愧为最体贴民情的慈善家。正因为这样，雨果才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将一切几乎不可能表达的事物，表现和塑造成为与诗歌美同具感染力的世界，不断地从现实中分离出崇高、又从崇高中分离出真实，把这个富有魅力、又充满邪恶的神秘世界，同悲喜剧并存的人生，有机地旋转在同一舞台上，启发世人用心地学会生活的艺术。

其实，在法国的文化史上，自法兰西民族开始创立自己的语言，逐步从罗马帝国独立以后，在各个历史时期内，总是大师辈出，个个像雨果那样，既有作家的创作能力，又有诗人般的才华和哲学家的敏锐思想；而到了 20 世纪，当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危机异常尖锐、人类创造灵感惨遭厄运的时候，正是当代的法国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诗人们，很突出地以其惊人的创造生命力，独领风骚，将 20 世纪谱写成富有思想性、可与任何伟大时代相媲美的历史乐章。

同济大学法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恰巧在“中法文化年”的历史机遇中建立。它的适时诞生，正好见证了对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以及对推动中法文化思想交流的时代意义。由本中心主编，并受五位德高望重的法国哲学家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以及全国杰出的同行们所构成的编委会的监督和指导，《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秉承开放和自由的学术研究原则，一方面将及时地收集和发表我

们这个时代对于法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专著，另一方面还要有步骤地翻译优秀的法国思想文化作品，以促进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为此，我们竭诚欢迎全国研究法国思想文化的同行们，共襄盛举，将《同济·法兰西文化丛书》真正办成开放而又活泼繁荣的中法文化交流的学术园地。

高宣扬

于上海同济大学

2004年10月

目 录

丛书总序

自序 你/我/他 (1)

第一章 缘起:说话的声音 (15)

第二章 悼念 (47)

第三章 别一种思辨能力:算计/礼物 (69)

第四章 分心:他与她的距离 (99)

第五章 远与近 (121)

第六章 朋友 (143)

第七章 语言的“巴别塔”:翻译与词语 (155)

第八章 自传的署名问题 (183)

第九章 艺术 (199)

第十章 康德·德里达/美·绘画 (223)

第十一章 如何“解构”马克思 (247)

第十二章 宗教 (277)

第十三章 毁灭:希特勒/海德格尔/德里达 (301)

尾声 恐怖时代的政治哲学 (325)

自序

你 /我 /他

谈话？与谁谈话？何时？何地？用何种语言？

与你谈话？你，德里达。你与我真的可以谈话？谈话是怎么发生的？

我是谁？这本书的作者？还有他，抑或她、它？

总之，你、我、他，以及这些人称的各种变化形态，是这本书的主角。

我在写作或讨论会发言时，总习惯于在各种人称后面加上“认为”或者在某某“看来”之类，尽管我不知道那些人称所发出的信息是真的还是假的。换句话说，可能有人在说假话。我讨厌多年来用了这么多“认为”，但实在又迫不得已，否则，别人会说我没有遵守规范。比如，我想用“你”代替“德里达”，用一个人称代词替换一个专有名词。这个转换非同小可，因为我没有遵守学术规范，我冒着风险且必定为此付出代价。

“你”与“德里达”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语气与味道！当我直呼

你的名字，读者的目光是形而下的；他们想到你，对当今世界文明影响极大的法国哲学家、1930年7月15日出生在阿尔及尔市郊的一个以法语为母语的犹太小孩，你发明的“解构”一词，你的书，如此等等。如果读者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就会问，德里达是谁？这时，你的名字与“他”或“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专有名词“德里达”在读者和解释者的内心独白中，既可以转换为“他”，也能换成“你”。我在问，为什么使用“他”这个词就符合学术规范，而用“你”就犯规。我决定用“你”，因为在我的潜意识中，觉得这样特亲切。

是的，当我用“你”，读者的目光是形而上的。尽管读者可能知道以上列举的你的那些形而下经历，但是“你”还是比“德里达”更加玄奥，为你蒙上了面纱。我以下的谈论完全是形而上的：当一个人说“你”时，提到“你”的那人称就是“我”，“你”一定是对“我”而言。如果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当然，对“我”而言，还有“他”或者“她”，但这两个称呼绝对不如“你”更贴近我，就其距离更遥远而论，“他”或“她”也就相当于毫无活力的“它”。

这里有三个基本名称：你、我、它。什么是“它”？“我”或“你”的理解、感觉、幻想、爱好、情感、思想的对象或者叫某某事物，就相当于“它”，一个类似于胡塞尔现象学中“意向对象”的东西。但是，“你”不等于“它”，因为“它”是某事，而当我说“你”时，你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任何具体或者抽象的实在，不在那儿也不在这儿。但“你”却是活的。当你在场时，它就不在；它在场，你也不在。“凡说‘你’的人，就不拥有任何东西了，他什么都没有，只是站在一个关系上的。”^①马丁·布伯如是说。马丁·布伯这里所谓“他”就是“我”，因为正是我称呼德里达“你”。这并不是蓄意兜圈子，仔细想一想，人生的经历，无非就是与你、我、他、她、它等等打交道。但是

^① 马丁·布伯. 我与你[M].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3:2.

这些关系差异极大。

无论如何,他、她、它——总是在我的把握之外,我无法拥有,与我是外在的关系。可是没有“你”,“我”就活不了。奇怪的是,你在我眼中,已经不是一个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中的“他”,换句话说,我与你并不发生外部经验的关系。另一方面,我已经无法走出与你的关系。当我把德里达,一个“他”称作“你”时,“你”比“他”对我更亲近,对我说更多的话,告诉我别人不知道的更多秘密。“他”却是冷冰冰的,对我不理不睬,没有味道。我对“你”无法经验,却使我写下的字宛然具有艺术性质的形而上学。

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法国新小说家布托尔在《变化》中,不把男主人公称作皮埃尔或者米歇尔之类,而像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一样,把他称作“你”:这个“你”坐在火车上,从巴黎去一个外国城市,那里有他的情妇,不是去玩而是去结婚。这里的关键之处,从普通小说向形而上学小说过渡的桥梁就在于,布托尔没有按照“他”的线索叙述一个浪漫故事。那个男主人公始终都是布托尔叙述的“你”。作者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假如“你”成了“他”,不但必须为“他”起一个名字,还要介绍“他”与世俗世界的各种庸俗关系,最后的结果,只是成就了类似于像学者们常用的“某某认为”这样的公式一样平淡的爱情故事。但是布托尔选择了“你”,“你”有最大的灵活性和神秘性。在读者眼里,“你”的身份、去处、将要做什么等等都不是“他”所能事先决定的。结果,这个火车上的“你”在“天色微明时,他明白他爱的不是他的情妇,而是一个以著名城市的形象使他着迷的外国女人”。^①于是,“你”选择了不结婚,返回巴黎。这部小说没有选择“他”,结果“他”的目的、小说开始时的预期、读者的盼望,一个也没有实现。就像我本打算写一本关于德

^① [法]皮埃尔·德·布瓦岱弗尔. 1900年以来的法国小说[M]. 陆亚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03.

里达的书,结果却写成了这样一本如何写德里达的书。怎么写呢?我决定与他谈话,但谈话者又不是“他”,而是“你”。那么,我写的“你”还是(或者还像)德里达吗?同样性质的问题,布托尔上述故事中的“你”岂不是白折腾了吗?问题的玄机正在这里,“你”并没有虚度在火车上的时光,因为这个过程,“你”视觉范围内其他旅客的种种表现,包括“你”不在场时这些旅伴的现在、过去和未来,就是布托尔的《变化》中实际发生的内容。严重的问题在于,布托尔在这里描述的情形具有普遍的哲学价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能实现自己想做的事情(还包括说过的话、承诺、文章的写作意向,比如在这篇序言中我向读者承诺了书的正文中的内容),而是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附带或者偶然引起的其他事情,这就是生活,也是本书写作过程会实际发生的情形。

从我的立场,德里达变成了你,这个转变似乎只是形式上的,可是,问题的深刻性正在于此,因为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正是怎么写决定了写什么。当我用“你”代替德里达时,德里达“牺牲”了,因为“你”比德里达有更多的可能性,“你”不像德里达只生活在经验的时间与空间内。换句话说,“你”有更大的精神自由。但“你”也要付出代价,就像马丁·布伯说的,“它”世界从此向你关闭大门。

他、她、它与你有什么共性吗?他、她、它与我之间是外在的经验关系,我能够经验它们,但它们总是远离我的内心世界;你是我无法经验的,却与我须臾不分;我能清晰地看见他、她、它,却更真切地体验到你。当我这样说时,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神秘的艺术境界。

普通人体验不到你,他们能盯着你的照片,看你的书,听你的讲演,但他们经验到的是你的身体,不是你本身。我也是这样,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作为读者,偶尔有了灵感,才与你相遇。所以我在这里郑重承诺,在我的正文中,当我用“你”代替你的名字

时,我是与你的幽灵谈话;当我直接提到你的名字德里达时,你和我一样,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换句话说,我什么时候称呼你,什么时候称呼德里达,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2001年,法国出版了一本采访德里达的专集,集子的名字是《嗜好诡秘》。你是诡秘的,我与你之间的谈话既不依靠呆板的书本知识,也不根据我有幸与你的几次会面(2000年在巴黎,2001年在北京)。我与你的谈话好像来自心灵感应,一种没有道理可讲的直接交流,不借助概念、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无目的、非功利。我的精神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懒洋洋地拽着你漫游,不拒绝任何旁门左道,从而敞开了精神的各种可能性。与你在一起时,与你相对应的我也改变了对时间的看法。我与你相遇,你就是唯一的现在,你把时间定格为一种描画不出来的姿态。从这种姿态中,我不能推断你曾经的样子,也说不出你将要走的路。与此同时,你现在的容貌丰富无比,包容丰富的时间十字路口。我总在这些路口与你相遇。此时此刻,你在我眼中不是活动在世俗时间中的德里达,不是“他”,没有被一大堆表面世俗的事务缠身。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对“现在”的看法与众不同:如果把“现在”理解为“此刻”实实在在地拥有一个对象,那么现在拥有物质生活的这个人连同他的对象一起实际上只属于过去。^①引申开来,这个人只想利用对象,比如享受一个女人,他误以为在那一刹那是唯一的现在,时间的定格,但其实不是,因为他在拥抱这个裸体的同时就已经厌烦了,只是说不出。这种“虚浮易逝”的瞬间不是马丁·布伯所谓的“现在”,因为这样的“现在”没有持久的真实。“持久的真实”并不是一个持续的你,也不是在时间中变化着容貌的女人。当你从一个身体的对象变成我的对象或者你时,我在“对象”上加上了引号,你被悬隔出来,获得了持久的真实,而对象是属于过去的。

^① 马丁·布伯. 我与你[M].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3:13.

“你”不是一个观念，不存在于柏拉图的观念世界，不高居我的头上，不是我回忆的对象，因为只有当我“看见”你时，你才出现。我把这里的“看见”理解为领悟，领悟使你成为我创造的一件作品，我的创造过程就是不中断地让德里达变化为你，离开这个过程就没有我。你是一个化身，一种激发和被激发的力量。与你在一起，我能开拓没有时间的时间，没有空间的空间。这是一种爱的体验，但这情感与那个只知道拥抱女人身体的凡夫俗子无关。真正的爱不担心，也不在乎背叛，不期待回报。不懂得爱的人是无法接近你的。凡人经历了性交，就把这种享受称为爱，其实这不是爱，而是疼痛和焦虑。拯救人类，就是使人从这样的幻象中解放出来，遭遇任何庸俗感觉都感受不到的“你”——一个并非简单理解为德里达化身的你。

我必须对你负责，因为没有你就没有我。我与你遭遇的机会不多，故格外珍惜。为什么遭遇不多？因为我是凡夫俗子。在与你谈话时，我与你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可当我停笔时，我就会溜号走神，成为一个“他”，拥抱我身边的她，就像马丁·布伯说的，“成为一堆有质量有形体的单位了”。^①从他、她、它到我与你，中间并没有隔着万里长城，其间的过渡几乎在一瞬间就会完成，就像从蛹中化出蝴蝶。蛹和蝴蝶有什么区别呢？蛹受限制、被人操纵、让人随便触摸；蝴蝶是超越的、自由的。令我疑惑也让我沉醉的是，我什么时候变化为他或它，或者反过来，什么时候从茧蛹突变为蝴蝶，是琢磨不透的。

真正的谈话是平等的，但是不存在于我与他、她、它之间。我与他（她、它）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争夺领导权的战争，你死我活，但我与你的关系不是这样。另外，也要警惕有虚假的谈话，即带着功利目的或阴谋诡计的谈话。

^① 马丁·布伯. 我与你[M]. 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3: 18.

真正的哲学家、艺术家、有创造性的科学家，我们之所以称他们为大师，乃因为他们有化“它世界”为“你世界”，^①化庸俗为神奇的本领，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普通人，是一个个的他或者她，且面对着无数的“它”。对于一个试图享受创造性生活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不能把“它”混淆为“你”，更不能把“你”等同于“它”。

我与你之间建立的谈话关系标志着建立起一种独特的精神世界，一个非对象的世界，一个关系的世界，一个靠缄默的心灵感应维持的世界。每当我与你说话，“它世界”就不说话，因为它插不上话，不懂我与你之间说的话，不懂我与你之间的精神生活。当然，我不仅可以把德里达当作“你”，任何人都可能成为我眼中的你，只要你有资格成为“你”。同样，在你的眼中，我也成为你的“你”，别人的“你”，而你和别人也自然就成为“我”。

我在你的书里与你遭遇，这一次你想消解“我”。我用你的语言阅读，却用我的语言理解，用我的语言写作，我从来没有向你解释这之间的过渡或翻译是如何发生的。我把你的母语用法引进我的母语，成为我的语言，诱惑读者的意向，以便形成一个怪胎。毫无疑问，我们俩的目光不同，我是偷窥者，在暗处；你显然在明处，处于不利的位置。这里发生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冲突，冲突的实质在于，我与你谈话，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谈话、两种都不能被当作工具的语言之间的谈话。这两种语言之间并不存在派生的关系，不是主仆关系。我与你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我与你谈话，不是与我的主人谈话。我也不是到你家做客，你只管接待（款待），我只管接受你的赐予。就此而言，我与你之间发生的不仅是语言关系，这种关系也是最原始的伦理关系、政治关系。换句话

^① “它世界”与“你世界”的提法，参见马丁·布伯.我与你.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3：33.

说，谈话的问题是相互理解的问题，相互理解的问题变化为翻译的可能性问题。我好像窥视到你对我笑，因为你曾经引证圣经里的故事，说上帝不允许人类建造一座通天塔，即只说一种语言的巴别塔，故意弄乱了人类语言，阻碍人种之间的交流，引发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由于误解而导致的无数战争，语言的战争。

在与你的谈话中，我是一个不自觉的翻译者吗？抑或我又自觉地以我的母语，甚至以我的古代母语与你的母语相抗衡。我们俩的风格、书写、用词、诠释方式互不适应，这也同样增加了我们谈话效果的不确定性。当 I 想到你时，我称你为德里达，只有德里达莫名其妙地站在我面前时，我才不叫你的名字，而说“你”。

你来，再来——的方式有些像中国迷信中的招魂，究竟来还是没来，只是信念的问题。

无论如何，在你眼里我是一个外国人、陌生人，这两个中文词在你的母语中是一个词，你理当款待我，把我当作一个不认识的朋友。别顾忌你的书面语，你在纸上对我说的同时，我就翻译好了。谈话是相互朝向对方的翻译过程，双方的内心独白，既使用又不使用词。但是要让谈话真实发生该有多难！我与你都遭遇外国语、陌生词、奇怪的词，我们就用这些交换想法，在死胡同中寻找出路，在混乱中寻求同一，选择一条路，放弃别的路。用我的词交换你的词，就像用我的货币交换你的货币，你和我，有能力识别其中的假币吗？用一种钱生出另一种钱，导致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剩余的语言，就是不能返回老家的语言。好的翻译，就是要抹杀原本的意义，增生新的信息。

我与德里达说过几次客气话，但那算不上谈话，因为我几乎不会说法语，我只会读。换句话说，我与你的谈话只发生在你的书本上，你的字就是你的话。这些文字是否对我说话，取决于我是否读它，是否建立起我与你的关系，就像我无论什么时候，从哪个角度欣赏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她的眼睛都会盯着我微笑。我

与你之间，经历着没有声音的谈话，那些发出声音的法文词与中文词似乎没有必要。没有声音的谈话又是简单的，因为倘若有声音，你我之间还要站着一个翻译。没有声音的谈话是一种特殊的谈话，因为词语并没有说出来，只发生了我的独白——内心独白，因为我不可能对着你的书本说话。内心独白的“词”躲在说出来的词背后，与其说独白是意识分析的对象，不如说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对象。就好像鲁迅笔下的阿 Q 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嘴上告饶，“我是瘪三”——心里话却是“就算被儿子打了”——另外一种语言，说不出口的语言，就像一句法文在我的笔下寻找汉语出路，再也不能用法文发音。从“我是瘪三”到“就算被儿子打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着深刻的内心独白过程，一种心理变形，就像翻译过程离不开文字变形。你与我之间需要类似的精神分析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精神分析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与拉康和索绪尔的态度相当一致，它告诉我们，人们表面上想的是一回事，但真实发生的是另一回事。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就居住在这个家中。德里达教授，你有你的家，我有我的家。是的，两个家的设计、摆设、居住习惯都不一样。比如，我用汉语说“我”，无论这个说话的主体（我）在一句话中的位置如何，都是没有词形变化的“我”。但你的语言中至少有三个“我”（je, me, moi）。当我说，“我记得……”为表达相似的意思，你说“je me souviens”。令我百思不解的是，你的母语为什么用了两个“我”？而我的母语只用一个。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谁在说话时用的“我”多，谁就有精神抑郁症或者强迫症，乃至精神分裂症（笑）。不是吗？“je”和“me”是同一个“我”的不同精神形态，处在不同的语法地位，它们是两个不同视角的“我”且相距如此之近。你和海德格尔的语言都是滋生精神分析的沃土，因为“我”背后还有“我”，其中的一个并不在场，无法翻译。

你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学到的本领，简言之，可以概括